

音乐视角下的唐宋词流变论

唐悦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唐宋时期,词与乐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乐器一变,词的形式既随之而变,词的情调、音律也随之而变,这正是唐五代两宋词风格迥异的关键。而在词与乐相离合的过程中,乐与同时代文人之间的配合也对词的风格流变有直接影响。总之,唐宋词在音乐的影响下逐渐从音乐性文学向纯文学转化。

【关键词】唐词;宋词;乐器;雅化

【中图分类号】I207.23;J6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5)01-0091-04

DOI:10.16104/j.cnki.xccxb.2015.01.027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明总论》云“一代之文,每与一代之乐相表里”。隋唐至宋时期,燕乐是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新型音乐体系。它是以西域音乐为基础,融合了中原音乐、南方音乐所创造出的一种与雅乐相区别相对立的音乐体系。它突破了传统音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审美规范,以“繁声淫奏”来快人耳目,宜于唐人抒发心绪,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追求,因而在唐开元、天宝年间,燕乐达到了极盛。词就是在燕乐这一音乐环境中产生的诗歌,几乎燕乐所有的特点,都能在词里反映出来。至于词的音韵平仄,句式长短,无不受燕乐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后,燕乐就开始渐渐衰退,到了南宋,燕乐与词逐渐分离。因此,词也从最初的配乐而歌和以声填词的音乐性文学,逐渐演变为脱离了音乐附庸的以律作词的独立文学。可以说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与流变。唐宋词呈现出的诸多风格特征,与燕乐乐器的变化及其音乐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笔者拟通过从弦管乐器的变化及其带来的词体变化来认识音乐对于唐宋词流变的影响,以期把握词体体性的复杂性。

1 乐器流变:从“琵琶为首”到“管色为主”

燕乐作为一种新型的音乐体系,它包括了多种音乐形式,如声乐、器乐、舞蹈、歌戏等。而作为燕乐表演所使用的乐器,对音乐风格的构建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每个乐器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殊声响,在不同的完美程度上把那些不同质的声音召唤出来。如宋翔凤在《乐府余论》说:“北宋所作,多付箏琶,故啾缓促而易流,南渡以后,半归琴笛,故滌荡沉渺而不杂。”^[1]姚华亦云:“五代、北宋词,歌者皆用弦索,以琵琶色为主器;南宋则多用新腔,以管色为主器。弦索以指出声,流利为美;管色以口出声,的

矚为优。此段变迁,遂为南北宋词之关键……主器既因时而异色,歌者亦因地而异音。中州音与吴音不同,尽人而知矣。”^[2]沈曾植《菌阁琐谈》说“五代之词促数,北宋盛时啾缓,皆由燕乐音节蜕交而然。即其词可悬想其缠拍,《花间》之促碎,羯鼓之白雨点也。《乐章》之啾缓,玉笛之迟其声以媚之也”。这三人都明确地指出了南北宋词体风格与管弦乐器的使用有关。因此,主要乐器的使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会影响到音乐及其歌词的特点。

1.1 唐至北宋词,以琵琶色为主

琵琶为燕乐的主要乐器,八音的律调来源,都是出自于琵琶。如《辽史·乐志》所云“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亦如清代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一云“燕乐之原,出于琵琶”、“燕乐之器,以琵琶为首”。这些说法都承认琵琶是燕乐的主要乐器。燕乐所使用的琵琶主要是四弦四柱的曲项琵琶,四弦分别为宫、羽、商、角四声,每条弦上均成七调,故燕乐共有二十八调,音域宽广,有丰富的表现力^[3]。唐时燕乐的精神在弦乐,它节奏明快,声调繁复,感情热烈奔放,声音具有变化性的穿透力,快人耳目。

关于琵琶的声音,在唐代诗人的描写中,最生动形象的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段话不仅突出了琵琶女高超的技艺,同时还把琵琶作为弦乐器之首的声音的多变性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由于琵琶声音的这种表现力和穿透力,使得唐代燕乐都是依琵琶定律的。琵琶在唐、五代时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简介:唐悦(1990-),女,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

期一直处于占统治地位的乐器,“唐末、五代有多少离奇变化的小令,即是在这嘈嘈切切的琵琶声里酝酿出来的”^[4]。我们不妨举出几首来看:

诉衷情

韦庄

碧沼红芳烟雨静,倚兰桡,垂玉佩,交带,袅纤腰。鸳梦隔星桥,迢迢,越罗香暗销,坠花翘。

调笑令

冯延巳

明月,明月,照得离人愁绝。更深影入空床,不道帏屏夜长。长夜,长夜,梦到庭花阴下。

从这些小令的转折变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琵琶声音的繁杂错综之美。小令中音律情调的异样,不得不和琵琶声调的影响密不可分。

到了北宋,虽然燕乐已渐渐衰落,但奏琵琶唱词在宋代依然十分流行。很多唐朝乐工流落民间,对于琵琶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由于唐朝对于琵琶演奏技法的改革,使得原本需要拨弹演奏的琵琶成为可以用手指进行演奏的乐器,使得琵琶也适宜于女性演奏。于是宋代的歌妓就成为了演奏琵琶的主要群体。词人与歌妓的密切关系使得琵琶日渐成为词人们创作词作的主要内容。再加上琵琶本身凄婉哀怨的声音特性与词婉约柔媚的风格相符合,从而被词人所接受,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后焕发出了高于琵琶本身的艺术光芒和艺术魅力。北宋时期的琵琶已经不同于唐五代词中音乐属性和文化属性相混合的混沌状态,其文化属性开始逐渐凸现出来。我们举几首词看看:

临江仙

晏几道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隔帘听

柳永

咫尺凤衾鸳帐,欲去无因到。虾须窄地重门悄。认绣履频移,洞房杳杳。强语笑。逞如簧、再三轻巧。梳妆早。琵琶闲抱。爱品相思调。声声似把芳心告。隔帘听,赢得断肠多少。恁烦恼。除非共伊知道。

综上所述,不管是燕乐盛行的唐、五代还是燕乐趋近衰落的北宋,乐器仍以弦乐为主,琵琶更是这些乐器之首。

1.2 南宋多新腔,以管色为主

南渡以后,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燕乐的衰落消亡,琵琶的地位也逐渐被笙、笛子等管乐器所取代。伴随着燕乐和琵琶地位的衰落,琵琶曲也趋近消失。张炎《词源》说:

若曰法曲,则以信四头管品之,其声清越……大曲则以信六头管品之,其声流美……惟慢曲,以哑篪集合之,其音甚正……^[5]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醉吟商小品序》说:

石湖老人谓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传矣!日《护索梁州》、《转关绿腰》、《醉吟商胡渭州》、《历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谒杨廷秀丈于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译成此谱,实双声耳^[6]。

可见唐以来的琵琶曲,逐渐消灭了,到南宋时琵琶曲已散亡磨灭,弹琵琶的人也罕见了,甚至连品弦法都几乎失传。再看南宋的歌词,几乎全都是管乐器了。这类词作较多,举以下几首为例:

菩萨蛮

朱敦儒

风流才子倾城色。红缨翠幘长安陌。夜饮小平康。暖生银字簧。持杯留上客。私语眉峰侧。半冷水沈香。罗帷宫漏长。

恋绣衾(宫中吹箫)

刘辰翁

胭脂不浣紫玉箫。认宫中、银字未销。但凤去、台空古,比落花、无第二朝。天涯流落哀在,听乌乌、不似内娇。漫身似、商人妇,泣孤舟、长夜寂寥。

在管乐器影响下的南宋词,形式漫长,虽不及小令之变化多端,但是也优扬雅正。

从唐到南宋,燕乐的乐器也完成了从弦乐器向管乐器转变的过程。对于管弦乐器的更替,刘尧民说:“我认为南北宋的弦乐器与管乐器之新陈代谢,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可以说,弦乐器之衰落,也就是燕乐之衰落,因为燕乐的精神,完全是寄托于琵琶之上,到南宋时琵琶曲逐渐消灭,这就代表从唐以来的燕乐到此逐渐消灭了。虽然南宋时的管乐器也有燕乐之名,然而不是燕乐的真精神而是燕乐的变形了。”^[7]看唐、五代、北宋的词主要是以小令为主,所用的乐器是琵琶。到南宋时则是慢词流行,而乐器也以管乐器为主了。

2 体性的流变:从俗变雅

雅与俗是唐宋词中两个重要的美学概念,也是两种对立的审美趣味与创作风格。唐宋词由俗向雅是词体本色流变的总体趋势,从花间词风到南宋雅词,词的雅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开

始时的俗词还是后来雅化的雅词,词体的每一次体性转变都与音乐息息相关,尤其是南宋雅词更是在音乐与南方文人的影响下雅化的。

词产生之初,只是诗余,到了晚唐温、韦之后真正成大气候。他们以《花间集》为代表建立了以小令为主的第一个词体性格的传统形态,即以婉约为特征的花间词。五代时期的欧阳炯就在《花间集叙》中归纳总结了词体体性的特点:声文谐会的传统、和律可歌的音乐性、以男女情爱为主要内容、享受风气下的富贵性、用助娇娆之态的女性化、用资羽盖之欢的娱乐性等。从这些特点中,可得知词的世俗性是这一时期词的主要特征。词的世俗化,一是与当时以“胡夷里巷之曲”为主体的燕乐有关,词的产生就是为了配合燕乐歌唱的,燕乐的世俗直接影响了词的性质;二是和以描写男女情爱为内容有关,在描写感情时太暴露,不含蓄,流于世俗。正是由于这些影响,使得词在最初阶段就带上了浓厚的世俗文学特征。此外,作为当时主体乐器琵琶的声音和声调也对唐至北宋时期的词风有直接影响。

琵琶的声音特点是“以点成线,以点带面”,在以“点”构成“线”的演奏过程中“说尽心中无限事”。在演奏时要求每个音饱满圆润、明亮厚实,弱而不虚且力度均匀,这种点状的声音形态具有的颗粒性音质特征也构成了琵琶音乐风格中尖新自然的一面。另外在“音腔”的处理上,琵琶注重“润腔”,演奏中常用左手推拉弦的技法对余音进行润饰,从而获得音的弯曲性,这种弯曲性通常表现在琵琶演奏的结尾或音韵处理上,弹奏后利用余音进行美化和修饰,使音乐在发音过程中以高低、强弱、长短等变化而表现出一种动与静的变化,音与音的绵延,并配以琵琶自身音色的音腔润饰而给人以曲婉美妙的听觉享受。正是因为琵琶通过吟、揉、推、拨等丰富的音乐表现技巧,对由“点”所构成的余音绵延所达到的对音乐的修饰性,使得燕乐乐曲委婉抒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音断意连,回味无穷。才有了唐宋词中浅斟低唱,曲折婉转,绵延不尽的爱恨情愁之婉约格调。

琵琶声音的这种特点,使得词到了文人之手后,艳俗气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文人的影响下更甚了。甚至到了北宋,艳情俗词的创作几乎占据了词坛的主流地位,不仅染指的人数多,而且创作的数量也很大。清人江顺诒云:“倚声之作,莫盛于宋,亦莫衰于宋。常惜秦、黄、周、柳之才,徒以绮语柔情,竞夸艳冶。从而效之者加厉焉。遂使郑卫之音泛滥于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8]虽然这话有点

言过其实,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词的本色体性。笔者列举几例为证:

江城子

韦庄

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檀郎。

菊花新

柳永

若掩香帷论缱卷。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衣、恣情无限。留着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这些都是描写男女情爱的词作,由于语言较直白,感情较露骨,不含蓄,而被张炎评为“失其雅正之音”之作。

南渡以后,由于大量乐谱散佚以及南宋文人词主动疏离民间歌场,加之主体乐器的改变,使得词越来越雅化。正如龙榆生先生所言:“宋南渡后,大晟遗谱荡为飞灰,名妓才人,流离转徙,北曲(引注:实“南戏”也。)兴而南词渐为士大夫家所独赏,一时豪俊如范成大、张鎡之属,并家蓄声妓,或别创新声,若姜夔之自度曲,其尤其著者也,嗣是歌词日趋典雅,乃渐与民间流行之乐曲背道而驰。”词失去了鲜活的市井文化的滋养,失去了民间大众的热捧,只能越走越窄,最后被贵族和少数文人雅士所欣赏,这正是南宋词雅正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姜夔“词极精妙”,“高处有周美成不能及者”(杨慎《词品》卷四),同时他又通晓音律,可以说是南宋最为知音协律的词家。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使得他的作品只能在贵族宴会上由歌妓演唱,或者在少数文人雅士中传唱,却不能如柳词那般“天下咏之”。张炎也曾在《意难忘》词序中云“余谓有善歌而无善听,虽抑扬高下,声字相宣,倾耳者指不多屈。曾不若春蚓秋蛩,争声响于篱烟砌间,绝无仅有”,指出当时文人雅词之善听者“指不多屈”的现象。

南宋文人词远离民间市井后,文人对于民间所使用的弦乐器也不再爱好了,转而爱好那幽闲单静的管乐,因为管乐适宜于个人演奏。而管乐又有雅缓从容,音希淡远之特点,如笛声。笛子在宋代,是宋宫廷乐队和雅乐登歌主要伴奏乐器,因而宋词中不乏描写笛音的词作。笛乐器又有羌笛、玉笛等多种形式,其中玉笛外形精致,音色清雅,所奏乐曲婉约流转,动情旖旎,带有富贵华美之气息,其清吹之法更以音色“清越”而得名,恰能表现文人雅士闲适优雅的精神享受,如姜夔的词。相对玉笛而言,羌笛则音声高昂,富悲怆幽怨之感,如辛弃疾词。此

外,从音调音律上讲,笛音急促,又称“促管”可表达凄楚之愁绪,李清照在《满庭芳》中感慨梅花之“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以梅花遭受风雨蹂躏之情状,透过横笛传送,引发了诗人的无限浓愁。总之,相对于琵琶之尖新婉转,箫声之呜咽低沉,笛声更加高亢悠扬,清脆爽快,也更利于展现词作清朗悠扬之风格特征。因而,在这种清商乐的影响下,加上南宋文人词远离民间歌唱,使得南宋词逐渐脱离了音乐附庸而成为一种雅化的词体。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暗香

姜夔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想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鹧鸪天

张炎

楼上谁将玉笛吹。山前水阔暝云低。劳劳燕

子人千里,落落梨花雨一枝。

修禊近,卖饧时。故乡惟有梦相随。夜来折得江头柳,不是苏堤也皱眉。

白石词音韵清蔚,文辞典丽,在优扬的笛声中“健笔写柔情”,玉田词讲究词法,“雅词协音”,“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词的清新雅丽加之管乐乐器的演奏,使得情感更细腻婉约。

3 结束语

弦乐器与管乐器的交替,对于合乐的歌词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弦乐器时代的词是以小令为主,到管乐器时代的词是以慢词为主。乐器一变,词的音调、音律也随之而变,因而造成了南北宋词的風格差异。北宋以前之词繁促而流利,是弦乐器使之然;南宋的词涤荡而优扬,是管乐器使之然。而乐器与同时代的文人之间的联系,又影响了唐宋词体性的雅变。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由于受燕乐影响加上同时代的文人多与民间市井的歌舞场关系密切,使得词带有浓重的艳俗特征。南宋词因着文人远离大众又与清商乐配合而呈现古雅的特点。总之,唐宋词在音乐的影响下逐渐从音乐性文学向纯文学转化。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98.
- [2]姚华.给邵伯纲论词用四声书[J].词学季刊,1934(2):1
- [3]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7-10
- [4]刘尧民.词与音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296.
- [5]张炎.词源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1:8.
- [6]夏承焘笺校辑.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1958:171.
- [7]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00.

Tang Song C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Tang Yu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Abstract: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word and the instru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Musical instruments are in a variable, the form of the word is changed, the word mood, rhythm also change, which is a key factor in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wo Song style's difference. The words and music by clutc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usic with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also has a direct effect on rheological style of words. In a word, Tang and Song poe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usic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musical literature to pure literature.

Key words: Tang CI; Song CI; instruments; refinement